

目 录

西藏阿里札达县玛朗墓葬 M1 动物遗存分析与研究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札达县文化和旅游局 / 1

西藏林芝察隅县塔玛岩画调查简报

..... 西藏大学艺术学院 察隅县文化和旅游局 / 54

西藏林周彭江沟崖壁朱书题记的调查与初步研究 夏吾卡先 / 65

唐宋元明清时期连接西藏与中原的通道 巴桑旺堆 / 79

寂怒百尊曼荼罗的起源与形成 旦知才旦 / 104

塔波寺和阿契寺连珠纹形式传统辨析 易晴 / 133

15 世纪“蒲甘上师”汉藏圣地朝觐史实考 王诗晴 / 153

阿里新发现的藏文刻本《北斗七星经》——兼论该经在元以来的多语种翻译、
流传及多民族交流 熊文彬 廖旻 / 167

交往交流交融史视域下的西藏鼻烟和鼻烟壶 陈强强 / 207

混合性图像：青藏高原的佛教肖像与摄影技术（英文）..... 柳钰媛 / 230

吴忠信进藏与民国时期采玉勋章制度在西藏地方实施的历史背景
.....尼玛仓觉 / 265

川藏公路沿线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现状——基于民族心理距离和族际关系嵌入
的定量考察谢伟民 卓玛群措 / 283

汉藏就业群体择业倾向的差异及行业区隔研究——以拉萨市俄杰塘社区为例
.....徐君 刘超凡 / 301

18 世纪早期欧洲天文著作的藏文翻译
.....洛桑云丹 著 傅晓莉 才让环公 译 / 315

摘要 / 333

Table of Contents

Analysis and Study of Faunal Remains from Tomb M1 at Manam, Tsada County of Ngari Prefecture, Xizang <i>Institute for Conservation and Research of Cultural Relics of Xizang School of Archaeology and Museology at Sichuan University Culture and Tourism Administration of Tsada County</i>	1
Brief Report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ama Petroglyphs in Chayu County, Nyingchi City of Xizang <i>College of Art, Xizang University Culture and Tourism Administration of Chayu County</i>	54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n the Cliff Medicinal Inscriptions in Pengjiang Valley, Xizang <i>Shawo Khacham</i>	65
A Study on the Routes Connecting Xizang and the Central Plains during the Tang, Song,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Basang Wangdui</i>	79
A Study of the Zhi Khro Mandala and Its Origins <i>Tamdrin Tseten</i>	104
Analysis of the Pearls Roundel Motifs in Tabo and Alchi Monasteries <i>Yi Qing</i>	133

Research on the Pilgrimages of "Bagan Guru" to the Han-Tibetan Holy Sites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i>Wang Shiqing</i>	153
The Newly Discovered Tibetan Xylograph of <i>The Sutra of the Seven Stars of the Northern Dipper</i> in Ngari —— With a Discussion on Its Multilingual Translation, Circulation, and Ethnic Exchanges Since the Yuan Dynasty <i>Xiong Wenbin and Liao Yang</i>	167
Tibetan Snuff and Snuff Bottl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Interactions, Exchanges, and Integration <i>Chen Qiangqiang</i>	207
Hybrid Images: Buddhist Portraiture and Photographic Technology on the Tibet Plateau <i>Liu Yuyuan</i>	230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Order of Propitious Jade System in Xizang and Wu Zhongxin's Mission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i>Nyima Tshanchod</i>	265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thnic Communications, Exchanges and Integration along the Sichuan-Xizang Highway —— A Quantitative Study Based on Ethnic Psychological Distance and Inter-ethnic Embeddedness <i>Xie Weimin and Zhuoma Quncuo</i>	283
Differences in Career Orientation and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Between Han and Tibetan Employee Groups —— A Case Study of Ojietang Community in Lhasa <i>Xu Jun and Liu Chaofan</i>	301
The Translation of European Astronomical Works into Tibetan in the Early Eighteenth Century <i>Lobsang Yongdan Chinese Translation by Fu Xiaoli and Tsering Palgon</i>	315
ABSTRACTS	333

汉藏就业群体择业倾向的差异及行业区隔研究

——以拉萨市俄杰塘社区为例^{*}

徐君 刘超凡

内容摘要：本文基于拉萨市俄杰塘社区的田野调查，系统解构市场经济背景下汉藏就业群体行业区隔的生成机制及其对族际关系的形塑效应。研究发现，行业区隔的形成源于多重结构性要素的交互作用：现代性断裂导致藏族群体在就业资本积累中存在历史性滞后，形成技术密集型行业的系统性壁垒；社会资本的民族化区隔促使汉藏经营者依托传统网络构建“技能传承—资源获取”闭环，强化行业路径依赖；藏族传统职业认知中的“雅俗之辨”与外源性舆论压力构成文化规训机制，形塑集体择业偏好。研究突破既有理论范式，揭示市场调控就业资源对于就业格局改变的内在逻辑：汉族经营者通过产业链延伸创造多层次就业结构，藏族从业者在市场调控引导下突破职业边界，形成“嵌入式发展”的新型共生关系。这种市场驱动的技术扩散机制不仅扩展了藏族社会资本网络，形成了符合现代化发展需求的就业观念，更通过动态就业重构促进族际交往交融。研究为修正西方“就业空间侵占”叙事提供实证依据，指出行业区隔的双重效应——短期强化群体边界的同时，长期通过市场调控与职业流动催生互嵌式发展，对铸

^{*} 本文系四川省社科重点项目“西南地区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基于成都、松潘、拉萨多类型实证对比”（SCJ23ND54）阶段性成果。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实践性启示意义。建议通过职业技能培训体系革新与创业政策优化,推动民族地区就业资本的均衡配置。

一、问题的提出及相关研究回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发展推动了社会分层结构的弹性化重构,中国社会步入全面开放新阶段。在此进程中,“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社会格局逐渐成形。伴随西部大开发、新型城镇化等国家战略的实施,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显著加速,其表征不仅体现为少数民族城镇化率的持续提升,更在于非本地人口在边疆城镇开发建设、商贸流通及旅游服务等领域多维度的社会融入¹。作为西藏自治区的政治经济中心,拉萨市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下,与东部沿海地区形成了深层次的项目合作与要素流动格局,这既加速了国有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也促使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全面市场化转型。

市场经济纵深发展背景下,来自甘、青、川、滇等毗邻省份的汉族农业人口大规模涌入拉萨劳动力市场,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此类跨区域人口流动客观上促进了族际空间互嵌,但同时也衍生出新的社会关系张力。外来汉族流动人口在大棚蔬菜种植、缝纫业、出租车业、建筑装修等经济领域迅速占据主导地位,形成与本地藏族就业群体显著的职业分层结构化差异。这种行业区隔引发学术界的持续性争论:部分西方学者将其归因为政府主导的“政策性移民”机制,认为汉族群体对特定行业的垄断构成对藏族就业空间的系统性挤压²;而国内研究则呈现多元化视角,既有学者关注资源获取的族际张力导致藏族就业边缘化风险,也有研究强调外来人口的示范效应助推了本地居民市场经济意识的觉醒。部分学者认为汉族流动人口的进入与本地藏族居民之间在就业领域形成了竞争关系,使得藏族居民在就业中处于劣势地位。葛婧在《出租车行业流动人口调查》一文中指出,拉萨市的出租车行业从业人员存在由藏族向汉族的结构性的转变,主张政府应当介入其中,加强引导与管理³。亦有学者突出强调汉族流动人口对于本土藏族居民就业的带动与示范作用。如朱玲在《西藏经济市场化进程中的劳动力流动》一文指出:“外来劳动力在异地寻求生存和发展机会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1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编写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北京:民族出版社,2023:334。

2 Emily Ting Yeh, "Taming the Tibetan landscape: Chinese developmen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PH.D. dissertation, 2003: 354-358。

3 葛婧、曲立娜:《拉萨出租车行业流动人口调查》,《西北民族研究》2007(1):75-107,18。

对本地农牧民学习现代市场经济知识和掌握非农生产技能,对本地企业家的成长,具有积极的示范和推动作用”⁴。也有学者认为这一趋势对于拉萨市汉藏族际间关系的影响是合作与竞争并存。如刘玉皑认为,“拉萨具有多民族长期交错共居、经济共生互补和文化交融等构建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的有利基础,亦面临民族空间分布和民族交往相对疏离、经济领域竞争加剧等挑战”⁵。

当前研究存在的显著局限在于:一,对行业区隔的形成机制缺乏结构性分析,现有文献多停留于现象描述层面,未能深入解构教育水平、职业技能、文化资本等要素的交互作用;二,西方学界基于意识形态偏见构建的“政策移民论”“就业空间侵占说”等叙事框架,与拉萨劳动力市场实际运作机制存在本质背离。这种认知偏差已对族际交往舆论环境产生负面影响,不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要义。

本研究基于拉萨市汉藏就业群体的实证调查,试图突破既有研究的理论窠臼,重点探究以下核心问题:在市场经济制度同构性背景下,汉藏就业群体行业区隔的生成逻辑为何?这种经济领域的互动模式如何重塑族际关系格局?研究旨在揭示劳动力市场分层的内在机理,为消解族际交往张力、优化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提供学理支撑,服务于新时代民族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需求。

二、拉萨市俄杰塘社区及其汉藏就业群体经营倾向

拉萨市呈现出显著的新老城区分离特征,其东郊作为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典型场域,承载着本地藏族常住居民与跨区域汉族迁移人口的共生性聚居。这一空间形态的形塑过程与藏汉民族互动的结构性变迁呈现时空耦合特征。以俄杰塘社区为典型案例观察,该社区作为拉萨市“西延东扩”的城市化战略的产物,其空间生产机制值得深入探讨。

俄杰塘社区(1999年建制)位于拉萨市主城区以东4公里,其辖区行政面积0.64平方公里,空间边界由江苏西一路(东)、江苏达道(南)、藏热中路(西)及纳金中路(北)构成。辖区总户数3477户4652人,其中常住户770户1307人、流动人口2707户3345人。民族构成中藏族占67.3%(3132人),汉族占29.2%(1359人),与

4 朱玲:《西藏经济市场化进程中的劳动力流动》,《中国人口科学》2004(1):50-56,80。

5 刘玉皑:《拉萨构建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的基础、挑战与实践路径研究》,《西藏民族大学学报》2020(2):74-80,155。

回族 2%(93 人)及其他少数民族 1.5%(68 人)形成多元共生格局⁶。值得关注的是,迁移人口主体由内地跨省迁移的汉族经商务工者与西藏区内迁移的藏族经商务工者构成,这种复合人口流动模式客观上构建了藏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新型实践空间。

作为研究样本的俄杰塘社区,其空间特征具有典型性。该社区呈矩形空间布局,以纳金路、江苏大道等城市主干道为边界,形成周长约 3.2 公里的城市界面。值得注意的是,沿街居民自建房的商业化改造率达 92.6%,形成总长 2.8 公里的连续性商业带。这种空间转型使该区域兼具居住共同体与经济共同体的双重属性,其 234 家临街商铺构成观察拉萨市民族就业格局的微观样本。通过笔者实证调查发现,该社区临街铺面经营者呈现“双主体、多民族”的复合结构:汉族经营者占比 58.55%(137 户),构成市场主体力量,其经营领域集中于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和跨区域商贸;藏族经营者占比 33.33%(78 户),主要分布在地方特色产品经营和传统服务业;其他少数民族经营者占比 8.12%(19 户),涵盖回、土、撒拉等 7 个民族,多从事特色餐饮和民族文化产品经营⁷。这种就业结构的空间分布特征,既反映出市场经济要素的配置规律,也暴露出民族传统文化资本在职业选择中的路径依赖。特别是汉藏就业群体在技术门槛、资本投入、市场网络等方面的差异性配置,为理解就业领域不同民族从业者之间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重要的观察窗口。

本研究基于拉萨市俄杰塘社区外围商铺的实地调研数据,聚焦汉藏就业群体在经营业态选择上的差异性特征。通过精细化分类统计,具体至店铺从业品类而非传统行业分类,研究发现该区域 137 家汉族经营商铺呈现业态多元化特征,日用品零售商店、理发店、旅馆酒店、餐饮店构成主要经营领域,且各细分业态集中度较低,单一品类商铺数量不超过 2 家,异质性经营特征显著。相较而言,78 家藏族经营商铺则显现出明显的业态趋同性,73.08%集中在藏式茶馆(28 家)、藏餐馆(19 家)、咖啡馆(8 家)、酒吧(5 家)及日用品商店(11 家)五类传统业态,与汉族经营品类形成显著差异。

结合俄杰塘社区外围商铺中汉藏经营者对经营品类的选择,汉藏经营者之间确实存在从业与经营领域上的区隔,汉族商人活跃在更多的经营领域,藏族商人的经营选择具有高度同质化特征。

6 该数据由俄杰塘社区居民委员会 2023 年 7 月统计提供。

7 该数据来源于笔者 2023 年 7 月对俄杰塘社区的实地调研。

三、拉萨市汉藏就业群体形成行业区隔的成因

将俄杰塘社区外围商铺作为拉萨市汉藏就业群体间就业选择的一个缩影,探讨不同就业群体区隔的形成原因及其对汉藏就业群体间族际关系的影响,有助于重新审视现代化进程中拉萨市汉藏就业群体之间的族际关系。笔者结合对拉萨市长期的跟踪调研以及俄杰塘社区外围商铺中汉藏经营者的深度访谈,认为拉萨市汉藏就业群体间择业倾向差异与行业区隔主要由以下几点原因造成。

(一) 现代性的断裂

拉萨市汉藏就业群体间的行业区隔现象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要探究其本质,需要从现代性的视角出发。“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是具有相互排斥特征的社会,由传统向现代演进的过程就是现代化。”⁸在现代化的研究中,学者们长期受到社会进化论的影响,把人类历史看作是一个总的发展方向,并受着某种具有普遍性的动力原则所支配的过程,将社会的发展看成是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演进,现代化被看作是从一个必将出现的物质更丰富的世界中产生的一系列物质关系的变化。而吉登斯则认为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发展并非一种平稳过渡,现代的社会制度在某些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其在形式上异于所有类型的传统秩序,尽管传统与现代之间存在着延续,但其之间的断裂也是显而易见的,并将其称为现代社会发展的“断裂论”⁹。

正如吉登斯所言,现代化尽管是脱胎于传统社会,存在对传统的延续,但因其到来速度之快,与传统社会之间必然形成断裂。这种断裂既存在于同一社会的传统与现代的过渡之中,也会因地域、民族、社会发展的不同步、不均衡而引发。西藏相对封闭的自然地理条件与长期处于封建农奴统治之下的社会历史现实,使得当地的现代化建设处于“零基础”启动状态,从而导致现代性以绝对速度到来时,断裂愈发凸显。现代性的断裂作用于本地藏族居民就业方面最直接的影响则是就业资本的欠缺,这一因素深刻影响了现代化进程中拉萨市汉藏群体间的就业格局。

笔者在拉萨市调研期间,一位小有名气的藏族包工头 DJPC 对自己早年在拉萨的闯荡经历回忆道:“我第一次去拉萨是在 16 岁的时候,那时候是 1996 年,最开始也没想着要去拉萨打工赚钱什么的,就是跟五六个朋友一起去玩。那时候人都比较小嘛,拉萨

8 许广智:《西藏民族地区近(现)代化发展历程》,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8:1。

9 [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黄平校:《现代性的后果》,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4。

又是大城市，所以我们就是想着去玩。我们出发的时候，每个人身上都带了几千块钱，钱花完了就给家里打电话寄一些，又用光了就又打电话嘛。我们那会的话，家里都不重视教育，所以基本上都没读过什么书，就是你要读书可以，你不读书也没人管那种，所以也没有什么技能，就去工地上干体力活。”¹⁰

DJPC 在对自己早期从业经历的介绍过程中，反复提到“那时候啥子都不会”，只能从事体力工作，而他把自己在工作中的劣势地位归因于“没有好好读书”的人力资本欠缺，这也是众多的农牧区藏族青年在城市化进程中对自身就业困境最为普遍的归因。西藏地区特别是广大的农牧区，受到历史因素和传统社会教育观念的影响，21 世纪初期进入拉萨务工的农牧区藏族流动人口，普遍存在受教育水平偏低的情况，这极大地限制了他们就业过程中的行业选择，也是现代性断裂面前，农牧区藏族青年就业资本不足的重要体现。

（二）社会资本与行业壁垒

基于西藏与内地社会经济发展梯度所形成的族群性社会资本差异，构成了汉族与藏族职业选择模式的显著分野。外来汉族流动人口通过跨区域社会网络的“技术迁移”机制，将在原生地形成的现代性技能体系进行空间转移，形成具有路径依赖特征的现代服务业经营模式。而藏族从业者则主要依托民族文化资本的内生转化机制，通过符号化传统技艺、仪式展演等文化再生产方式，实现传统生计模式的现代化调适。

“社会资源”和“人脉关系”可视为在就业实践中，对社会资本的口语化表达。笔者对俄杰塘社区外来务工经商者的相关访谈内容，很大程度上也能呈现出社会资本对他们就业实践的影响。

俄杰塘社区一家名为“罗氏香辣牛肉面”的汉族店主 L JL，向笔者讲述了其在拉萨开店过程中社会资本为其带来的便利。“我是 1986 年出生的，今年 37 岁，四川德阳人。我和老婆是 2014 年来到拉萨这边开面馆的，如今已经经营了 9 年。当初选择来拉萨开面馆，主要是受到我老婆亲戚的影响。2014 年的时候，我老婆家好多亲戚都在拉萨这边开面馆，她姑父就跟我建议也来拉萨开一家面馆。有亲戚帮衬还是不一样，他们在这边十几年的人脉积累，他们帮助我的话，这些人脉我都是可以直接用的。”¹¹ L JL 在拉萨从事餐饮业之前，从未有过相关行业从业经历，亲戚的“传帮带”成为他能够成功在拉萨

10 访谈对象：曲水县其奴村藏族包工头 DJPC，访谈时间：2023 年 7 月 31 日，访谈地点：俄杰塘社区。

11 访谈对象：汉族老板 L JL，访谈时间：2023 年 10 月 7 日，访谈地点：罗氏香辣牛肉面馆。

开店的重要因素，社会资本对就业者的行业选择起着重要作用。

藏族经营者倾向于选择藏式餐饮业作为主要从业领域，这种就业实践本身也是受社会资本因素影响。一方面藏族从业者通常通过亲缘地缘关系网络获取传统饮食制作技艺的习得渠道，形成行业准入的技艺资本；另一方面依托乡土社会既有的熟人消费群体，显著降低市场开拓成本，构建起具有族群边界特征的经营业态。

拉萨市汉藏经营主体均表现出依托自身社会资本进行行业选择的特征，形成择业过程中对社会资本的路径依赖。这种依赖机制在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亦产生双重结构化效应：正向维度强化了民族特色产业的代际传承和文化再生产功能；负向维度则因为社会资本禀赋差异形成行业准入壁垒，导致劳动力市场不同民族行业区隔现象。

（三）基于传统文化“雅”与“俗”的认知

除了社会资本要素的影响外，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观念也会影响就业群体的择业倾向，这也是在一些行业门槛相对较低，却依旧鲜有藏族居民从事相关行业的重要原因。基于传统文化“雅”与“俗”的认知影响行动者的就业实践，在藏族从业者的择业倾向中最为突出，“雅”与“俗”成为藏族从业者是否进入一个行业的重要判断依据。

拉萨市的现代化进程是建立在传统社会发展基础上，因此在行业选择上，传统文化中的“雅俗之分”会在藏族群体的就业选择中直观呈现。最为典型的就是“铁匠”行业，在封建农奴制社会，西藏铁匠的社会地位长期较低，被称为“黑骨头”，认为铁匠天生就是低贱的人。因此，在古代藏族社会中，铁匠这一职业主要由铁匠的儿子继承，普通人家的子女多不愿与铁匠通婚，这一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职业，却在藏族传统文化中是众人避之不及的行业。拉萨的汉族就业群体，来自不同省份不同地域，鲜有对某一行业的“雅俗观”形成共识性意见。正如常年在俄杰塘社区以补鞋为业的汉族鞋匠 FZP 在谈及自己行业时，介绍道：“我一直不觉得补鞋是一个丢人的行当，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挣钱，没什么丢人不丢人的，我们老家从事鞋匠工作的人特别多，这份工作不仅自由而且没有太大体力劳动，是一个挺好的活计。”¹²

俄杰塘社区外围商铺中藏族经营者在经营范围上表现出高度的同质化，并最终呈现出汉族与藏族之间的行业区隔，与藏族经营者对于一个行业的“雅俗之分”有着很大的关系。而藏族就业者对于行业的“雅俗之分”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整体上都普遍接受认可的“雅”与“俗”，另一个则是就业者自身对行业认知评价中的“雅”与“俗”。

¹² 访谈对象：汉族鞋匠 FZP，访谈时间：2023 年 7 月 14 日，访谈地点：鞋匠摊位。

前者是在藏族就业群体中约定俗成，后者则存在个体差异的主观评判。

藏族传统文化中对于职业的雅俗之分，使得铁匠、屠夫等职业被贴上了“低等”“底层”的标签，甚至在如今的拉萨市就业格局之中，藏族从业者也会尽可能地避开这些行业，并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群体性共识。除了对“俗”的定义外，“吃藏餐”“喝甜茶”“喝咖啡”等深受藏族群体广泛喜爱的活动，其相关从业者，也被认为是从事着“高雅职业”，因而在俄杰塘社区的外围商铺中，藏族经营藏餐馆、藏茶馆、咖啡馆成为主流。

除了“铁匠”“屠夫”“咖啡馆经营者”“酒吧经营者”“藏餐馆经营者”“藏茶馆经营者”“公务员”等职业在藏族传统社会中被贴上群体性共识的“雅”与“俗”的标签之外，在藏族就业群体间因个人喜好而对职业产生的“雅”与“俗”的划分，也深刻影响着藏族人择业倾向。部分商铺经营者从事某些行业便是基于自己的个人爱好。

JGJ 和 BJ 都是西藏那曲嘉黎县的藏族，他们在俄杰塘社区合开了一家“兄弟台球馆”，当问及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开一家台球馆时，他们解释道：“我们来到拉萨之后，最初也是给别人打工，积累了一些积蓄之后，就想着做点什么生意，这样自己也轻松一些。我们两个就一起商量，感觉现在好多藏族，他们都在开藏餐馆、藏茶馆这些，这个行业竞争比较激烈了，而且我们之前也没有这方面的基础。因为我们两个都喜欢打台球，考察了社区周围，也没有其他的台球馆，我们就想着开一家台球馆挺好的，肯定有市场。”¹³

JGJ 和 BJ 选择经营“兄弟台球馆”是基于他们的个人兴趣爱好，是个体层次上对职业“雅”与“俗”的划分，因为自身感兴趣，所以愿意进入到相关的行业和领域。虽然现代化进程中的拉萨与传统社会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但是现代化依旧依托于传统社会而存在，因此在就业选择上，藏族青年会受到自身所处传统文化的熏陶，形成自己关于不同行业间“雅”与“俗”的划分标准，而这些标准影响到藏族青年的从业选择，从而造成汉族与藏族在行业间的区隔现象。

（四）基于传统社会的舆论压力

藏族青年的就业与择业不仅仅是受到自身社会资本和对行业“雅俗之分”的影响，外界社会环境带来的舆论压力，同样会影响到他们对行业的选择，这也是导致汉藏就业群体间产生行业区隔的重要原因。藏族理发师 AWRQ 的从业经历有利于我们理解社会

13 访谈对象：JGJ 和 BJ，访谈时间：2023 年 11 月 5 日，访谈地点：兄弟台球馆。

舆论压力对于藏族青年择业如何产生影响。

AWRQ 是一位藏族理发师，从给理发店干保洁再到学徒，然后独立开理发店，最终成为拉萨小有名气的藏族理发师。当前，AWRQ 开有两家理发店，在俄杰塘社区的这家理发店名为“阿旺造型”，上下两层共 320 平方米，共有理发师和学徒二十几名，其中很多都是藏族学徒。理发师这个行业，是传统上藏族很少涉及的行业，主要是外来汉族在从事该行业。而关于藏族很少从事理发行业的原因，AWRQ 认为主要受到传统社会舆论压力的影响，在藏族传统观念中，认为当理发师不是什么正当行业，而另一方面则是从事理发师学习，从学徒到小有成就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成本，而且早期的收入非常微薄。对此，AWRQ 以自身经历来进行解释：“我是 1991 年出生的，初中毕业之后，开始进入理发这个行业。我光干洗头我就洗了 5 年，之后开始学习剪头发，光说这个剪头发，从开始学习到能够给客人剪头发，最少也需要 2 年时间。很多藏族人不愿意当理发师的原因，主要的阻力就是外部环境的不理解和不认可，我的父母很长一段时间都觉得我这个职业的选择是很错误的，他们觉得我天天干这个没有什么前途，还不如正儿八经的去找点工地的体力活，这样工资也可观，不像我这样，浪费了这么多年时间，只是收获了这么一点点的工资。”¹⁴

藏族理发师 AWRQ 将社会舆论压力视为是藏汉之间形成就业区隔的重要因素，藏族青年的就业选择不仅是基于个人意愿的自主选择，同样也会受到所处社会舆论压力的影响。这种舆论压力不仅来源于对职业发展的固有认知，还受到藏族传统社会观念、文化、习俗等因素的影响。

四、拉萨市汉藏就业格局新趋势：市场配置下的多民族共工共业

现代化进程中拉萨市汉藏就业格局存在显著的行业特征，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以市场为导向的就业机制逐渐确立，受传统的“雅俗之分”观念和社会资本影响下的就业区分，正在被市场配置下多民族共工共业格局所取代。

（一）行业区隔的打破路径：市场配置下的就业选择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外来汉族流动人口进入到拉萨务工经商，对本地藏族居民就业带来的影响存在争议，部分西方学者认为外来汉族流动人口进入西藏，是对本地藏族

¹⁴ 访谈对象：藏族理发师 AWRQ，访谈时间：2023 年 12 月 18 日，访谈地点：阿旺造型。

居民就业空间的侵占，并且形成行业垄断，使得藏族居民在就业市场中被边缘化。在笔者对拉萨的调研中发现，传统的社会观念与社会资本一定程度上会造成拉萨市汉藏就业群体之间的行业区隔，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在就业选择中的配置作用愈发凸显，也随之产生新的就业观念与社会资本，并逐步打破汉藏就业群体间的行业区隔。

在市场配置下，很多藏族从业者通过参与汉族从业者的经营活动，最终获得相应技能与资源，并独立开展经营实践，对这些个案展开剖析，有助于理解外来汉族流动人口在拉萨的务工经商行为以及对本地藏族居民就业实践产生的影响。PQ 是拉萨市曲水县达嘎镇其奴村九组的藏族居民，在调研期间他向笔者讲述了他们家两个女儿跟随浙江服装店老板打工，并最终自主创业的经历：“我家里总共有四个女儿，因为家里经济条件不好，所以他们都是初中毕业之后就没有继续读书了。刚毕业的时候，我的二女儿和四女儿都在拉萨的温州商城里面给一个浙江的汉族老板打工，做服装销售生意。她们刚开始就是给汉族老板当服装店铺里面的销售员嘛，就是比较基础的那种，因为我的两个女儿普通话说得比较好，做事情也比较有头脑，很多事情老板就都会交给她们做。很多东西都不是老板有意去教她们的，都是在做的过程中慢慢学会的，她们也不是单纯地只在商城里面卖衣服，也会经常性地去浙江、上海这些地方去出差，洽谈业务。我二女儿跟着汉族老板干了十几年之后，销售上的技巧也掌握了，进货的渠道也有，于是就决定自己开服装店，店面就在温州商城里面。现在她都租了两个店面了，听她说一年的收入都要上百万了。四女儿现在还是跟着那个汉族老板在干，因为业务熟练，工资已经涨到了一个月两万块钱。”¹⁵

PQ 一家曾经是曲水县农村的贫困家庭，他的两个女儿在初中毕业后，选择到拉萨的汉族老板经营的服装店打工，这种就业选择并非是受到传统观念和社会资本影响，而是市场调配的结果。然而，这段打工经历最终改变了整个家庭的处境，不仅两个女儿都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收入，而且能够反哺自己的家庭，让 PQ 得以安享晚年生活。从 PQ 两个女儿的从业经历个案中，我们可以看出，市场配置在拉萨市汉藏就业群体择业中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市场配置以用工需求为导向，可以避免传统社会资本不足的影响，促成多民族共业的格局。藏族从业者在为汉族经营者务工期间，积累了自身新的社会资本，为打破行业间区隔奠定基础。

15 访谈对象：其奴九组藏族居民 PQ，访谈时间：2021 年 8 月 6 日，访谈地点：曲水县其奴村九组。

（二）就业结构的动态重构

尽管从宏观上看，拉萨市汉藏就业群体之间依旧存在着显著的行业区隔，正如前文分析，在就业资本欠缺以及“职业雅俗观”影响下，藏族就业群体择业出现明显的同质化倾向。然而必须认识到，随着外来汉族流动人口在拉萨务工经商者的增多，以及汉藏就业群体间的就业交往逐步加深，市场配置对就业结构产生的影响愈发凸显，拉萨市不同民族间的就业结构正在实现动态重构。拉萨市汉藏就业群体间就业结构的动态重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现代化进程中涌现出的新型经济活动，外来汉族流动人口将内地成熟的商贸模式，如服装批发零售、餐饮服务、物流配送等，引入到拉萨市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中，催生出一批符合现代化发展需求的新型岗位。以服装贸易为例，从早期单纯的店面销售，逐渐衍生出仓库管理、品牌代理、电商运营等衍生业态，形成纵向产业链。另一方面，在旅游业的推动下，以唐卡绘画、藏毯编织等藏族传统手工艺通过与汉族商人合作，开始采用标准化生产流程和市场营销手段。这种“传统技艺”与“现代管理”的融合，使很多藏族传统的手工业从传统的家庭作坊模式转向规模化、品牌化的市场经营，创造出更多的专业岗位。这些都是市场对就业实现配置的重要体现。

拉萨市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型经济活动虽然有些掌握在外来汉族务工经商者手中，但并非对其完全垄断，反而催生出多层就业结构，成为实现就业结构动态重构的关键。这一就业结构表现为，顶层是掌握核心技术和经验的汉族经营者，中层是经过技术培训的藏族管理人员，基层则是大量从事简单服务的本地藏族劳动力。这种分层的形成是基于就业资本的差异，有利于将不同层次的劳动力都吸纳进入就业市场之中，最重要的是这种结构分层为职业技能的培训和传导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因此，这种分层结构注定只是一种初期状态，在一段时间的就业交往之下，就业结构动态重构随之产生。很多藏族青年在加入劳动力市场初期仅仅作为基层的劳动者，但是通过“师徒制”“岗位实训”等方式，藏族从业者逐步对产品知识、服务标准、客户管理等现代商业技能实现掌握，从而跻身于就业结构中的中层甚至是顶层¹⁶。

在市场配置就业影响下，外来汉族流动人口在拉萨的务工经商行为带来的汉藏就业群体间的就业结构动态重构，具有“嵌入式发展”特征。外来汉族流动人口带来的技术要素通过制度创新和文化调适，内化为拉萨本地经济系统的构成部分。其本质是通过市场机制与政策干预的协同作用，在保持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前提下，实现就业结构的优化

16 马戎：《中国人口跨地域流动及其对族际交往的影响》，《中国人口科学》2009（6）：2-13，111。

升级。这一机制为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范式，特别是展示了后发地区如何通过非均衡路径实现现代化追赶。外来汉族流动人口在拉萨的务工经商实践，对于培养本地藏族从事现代化进程中的新型经济活动具有引导和示范作用。

（三）社会资本网络的扩展

市场对于就业的配置作用，有利于新型社会资本网络的生成。外来汉族流动人口在拉萨市的务工经商行为，同样建立起汉藏就业群体之间的就业交往联结，这种联结以雇佣关系最为常见。雇佣关系衍生的社会关系网络，相较于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能够突破民族社区原有的社会资本边界。大量的藏族就业者在与外来汉族流动人口建立雇佣关系的过程中，藏族就业者通过工作关系获取的跨区域商业资源，客观上促进了拉萨与内地的经济联系，形成社会资本网络化。正如跟随汉族老板从事服装贸易后独立开展相关生意的PQ的二女儿，她介绍自己在汉族老板手下进行销售工作的经历时讲述道：“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跟随老板一起做生意，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一段经历，在这期间我通过汉族老板间接地认识了很多生意上的合作伙伴，这也是我出来单干之后，能够获得成功的关键。”¹⁷拉萨的汉族经商者是将内地供应链网络与拉萨本地市场之间进行联结的关键，通过与他们之间建立雇佣关系，藏族从业者可以获得接触全国市场的机会，特别是弥补因就业资本不足而面临的供应渠道和销售渠道不足的问题。与外来汉族商人之间建立劳动雇佣关系，实则是藏族就业者实现社会资本网络扩展的重要路径。

社会资本网络的扩展经历了从“嵌入”到“重构”，最后实现“再嵌入”的过程，初始阶段外来汉族流动人口带来的外部网络通过与本地藏族就业者之间的就业交往嵌入到本地的经济系统之中；通过市场调控下的雇佣劳动，本地藏族从业者在新兴经济活动领域逐渐积累自身的从业技能与社会资本，实现原有社会资本网络的重构；在此基础上，最终发展成为具有地方特色的新型社会资本形态。这一过程突破了传统族际关系研究的视角，揭示了市场调控就业背景下更为深层的族际互动逻辑。

本地藏族就业者社会资本网络的扩展，不仅能够极大地带动自身就业机会的增加，而且能够推动民族地区城市的现代化发展进程，增进不同民族就业群体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17 访谈对象：PQ的二女儿，访谈时间：2023年12月14日，访谈地点：俄杰塘社区。

五、结论与讨论

拉萨市俄杰塘社区的案例，很好地呈现了汉藏就业群体间行业区隔的形成原因及其对族际关系的形塑效应。研究发现，汉藏就业格局的分殊化并非源自单向度的政策性干预，而是多重结构性要素交互作用的结果。首先，现代性断裂背景下形成的就业资本差异构成择业区隔的物质基础。藏族群体在教育程度、职业技能与市场网络等现代性要素积累中的历史性滞后，使其在技术密集型行业准入层面面临系统性壁垒。其次，社会资本的民族化区隔形成行业选择的路径依赖。汉藏经营者依托各自传统社会网络构建的“技能传承—资源获取—市场开拓”闭环系统，在降低交易成本的同时强化了行业壁垒的再生产。值得注意的是，藏族传统职业认知中的“雅俗之分”与外源性舆论压力形成文化规训机制，通过象征边界的建构持续形塑就业选择的集体偏好，这为解释同质化就业现象提供了文化解释框架。

行业区隔的表象下潜藏着深层次的族际互动逻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市场对于就业资源的配置作用，是打破汉藏就业群体之间行业区隔的核心要素，从业者在就业市场中的择业行为会受到市场需求的调控。藏族从业者摆脱对传统思想观念和社会资本的路径依赖，根据市场需求选择从业岗位是符合自身发展利益的选择。市场对于就业的调控，能够实现族际间共工共业，并重塑就业者的社会资本与就业观念，从而扭转传统观念意识以及社会资本对于就业者的限制，构建符合市场需求的现代化就业观念。这种以市场为载体的就业格局调配，突破了传统“中心—边缘”发展范式下技术扩散的单向性桎梏，形成“嵌入式发展”的新型族际共生关系。就业结构的动态重构表明，汉藏就业群体间的经济互动已从初期“技术垄断—劳动依附”的垂直结构，转向“技术扩散—协同创新”的网格化格局。这种转型不仅推动了藏族从业者社会资本网络的跨区域拓展，更通过产业链整合重塑了民族地区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衔接机制。

该研究对既有理论范式形成三重突破：其一，通过引入“现代性断裂”分析框架，突破传统人力资本理论的个体化解释路径，揭示就业区隔的历史生成性与结构制约性；其二，将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本土化改造，阐明职业选择中的文化习惯如何与市场理性形成张力；其三，以“技术转移—结构重构”的互动模型，修正西方学界基于冲突论构建的“就业空间侵占”叙事，为理解民族地区市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实践层面，研究发现就业领域的区隔与融合并存现象，客观上构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济基础——行业分工的互补性强化了族际经济共生关系，而技术转移带来的职业流动则创造了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场域。这提示民族工作应着重构建市场化技术传导机制，

通过职业技能培训体系革新与创业扶持政策优化，推动就业资本在族际间的均衡配置。

值得深入探讨的是，行业区隔的双重效应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演化趋势：短期内的就业分层虽可能强化群体边界意识，但市场机制驱动的技术扩散与职业流动，或将催生新型族际互动模式。本文的微观社区研究揭示，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的构建，本质上是传统社会资本与现代市场理性持续调适的过程，这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实证支撑。

◆ 徐君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教授
刘超凡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Differences in Career Orientation and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Between Han and Tibetan Employee Groups —— A Case Study of Ojietang Community in Lhasa

Xu Jun and Liu Chaofan

(Center for Tibetan Studies;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Based on field investigations in the Ojietang Community of Lhasa,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how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between Han and Tibetan workers within a market economy, and how it shapes inter-ethnic relations. The study finds that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stems from the interplay of multiple structural factors: first, the disruptions of modernization have led to a historical lag in the accumulation of employment capital among Tibetan groups, creating systemic barriers in technology-intensive industries. Second, the ethnic segmentation of social capital prompts Han and Tibetan entrepreneurs to create self-reinforcing cycles of skill transmission and resource acquisition closed loops based on traditional networks, reinforcing sectoral path dependency. Thir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refined" (*ya*) and "vulgar" (*su*) in traditional Tibetan vocational perceptions, combined with exogenous public opinion pressure, constitutes a mechanism of cultural discipline that shapes collective occupational preferences.

Breaking through existing theoretical paradigms, this research reveals the intrinsic logic of market-regulated employment resources in reshaping the employment landscape. Han entrepreneurs create multi-level employment structures through supply chain extensions, while Tibetan practitioners, guided by market regulation, transcend traditional occupational boundaries to form a new symbiotic relationship of "embedded development." This market-driven mechanism for technology diffusion not only expands Tibetan social capital networks and fosters employment concepts aligned with modernization needs but also facilitates inter-ethnic interactions and integration through dynamic employment restructuring. The study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to revise the Western narrative of an occupation of employment space, pointing out the dual effects of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While it reinforces group boundaries in the short term, it fosters inter-embedded development through market regulation and occupational mobility in the long term.